



ZHONGWAI JINGJI ZHUANGUIDU
BIJIAO YANJIU

中外经济转轨度 比较研究

张仁德 /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

张仁德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 / 张仁德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058 - 6410 - 8

I. 中… II. 张 III. 经济体制改革—对比研究—中国、外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636 号

责任编辑：王东岗
责任校对：董蔚挺 王肖楠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

张仁德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1 印张 290000 字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6410 - 8 / F · 5671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
一、关于经济转轨的概念	(3)
二、经济转轨的性质	(7)
三、经济转轨的时间起点和终点	(10)
四、经济转轨度与市场化程度：衡量与比较	(15)
五、转轨进程中的阶段划分	(17)

第一部分 中国与外国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安排

第1章 经济转轨与市场经济的内生性	(20)
1.1 计划经济内部的市场经济因素	(20)
1.2 经济改革——转轨前的准备	(22)
1.3 制度移植与本土化	(23)
第2章 市场主体重塑：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	(25)
2.1 俄罗斯的无偿分配制度	(25)
2.2 匈牙利的市场出售制度	(30)
2.3 波兰的分售制	(34)

2.4 中国的增量改革	(37)
第3章 市场竞争制度的建立	(41)
3.1 俄、波、捷：计划价格——自由价格	(41)
3.2 匈牙利：计划价格——混合价格—— 自由价格	(43)
3.3 中国：计划价格——混合价格——双轨价格 ——自由价格	(44)
第4章 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转轨	(48)
4.1 金融机构重组与创新	(48)
4.2 激进式、自由化的金融体制	(59)
4.3 渐进式、强控制的金融制度	(70)
第5章 政府职能转变	(81)
5.1 政府改革目标与转轨中的职能	(81)
5.2 各国政府职能转换方式与过程	(83)

第二部分 经济转轨度的设计与比较

第6章 转轨方式、市场化程度与转轨度	(94)
6.1 转轨理论与转轨方式	(94)
6.2 转轨度的提出及其特点	(97)
第7章 转轨度指标体系的设计	(107)
7.1 转轨度指标体系的三个基本维度及其内容	(107)
7.2 转轨度指数的形成和计算	(139)

第 8 章 中国和俄罗斯转轨度的比较	(149)
8.1 中俄转轨度的计算	(149)
8.2 中俄契约主导制度建设指数比较	(152)
8.3 中俄行政主导制度建设指数比较	(158)
8.4 中俄国民权利与自由指数比较	(162)
8.5 中俄转轨度的比较分析	(165)

第三部分 利益集团与经济转轨进程

第 9 章 第一行动集团：激进与渐进	(173)
9.1 计划经济下组织结构的差异	(174)
9.2 U 形经济组织中的利益集团与激进转轨方式的 选择	(177)
9.3 M 形经济组织与渐进转轨方式的选择	(179)
第 10 章 第二行动集团：掠夺与援助	(182)
10.1 掠夺之手：第二行动集团消极作用	(182)
10.2 援助之手：第二行动集团的积极作用	(189)
第 11 章 中俄利益集团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191)
11.1 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新动向	(191)
11.2 中国利益集团的新动向	(198)
11.3 新的利益集团与经济转轨：比较与评价	(206)

第四部分 转轨中的社会问题

第 12 章 转型期社会问题概述	(210)
12.1 社会问题的界定	(210)
12.2 俄罗斯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212)
12.3 中国转型中的社会问题	(223)
12.4 转型期社会问题的负面影响	(229)
第 13 章 社会腐败	(232)
13.1 中国的行政腐败	(232)
13.2 俄罗斯的黑社会与黑色经济	(238)
第 14 章 贫富差距悬殊	(246)
14.1 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	(246)
14.2 俄罗斯的贫富分化	(254)
第 15 章 就业问题	(262)
15.1 中国的下岗与失业	(262)
15.2 俄罗斯的就就业问题	(269)

第五部分 转轨经验与未来发展

第 16 章 制度移植与制度内生	(280)
16.1 对经济转轨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81)

16.2	制度变迁中的“准桔成枳”现象与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	(283)
16.3	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维度	(287)
第 17 章	自发演进与政府设计	(290)
17.1	混合经济是经济转轨的产权制度选择	(292)
17.2	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分化：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因	(295)
17.3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转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外因	(298)
第 18 章	经济转轨与政治约束	(301)
18.1	转轨的政治经济学	(301)
18.2	经济转轨的政治条件	(304)
18.3	中国渐进式政治改革的经验和意义	(307)
第 19 章	经济转轨与发展前景	(311)
19.1	经济转轨与市场化	(311)
19.2	经济转轨与现代化	(314)
19.3	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转轨经济	(317)
19.4	转轨国家的现代化战略	(319)
19.5	金融转型的重要作用	(324)
主要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37)

导论：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转轨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特殊群体，在 20 世纪末引起了经济学家广泛的关注。因为，这些转轨国家的转轨过程，不仅涉及大约占世界约 40% 的人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不同的战略选择及其阶段性成果的差异性，对已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另外，转轨国家在自然地理、文化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起点上的多样性，也使转轨经济的研究更加复杂。

自从过渡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学者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所发表的有关转轨经济或过渡经济的文献犹如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但是，大多为一般过渡经济理论（如盛洪、樊纲、张宇等）或我国转轨经济进程和经验（杨瑞龙、黄少安、陈宗胜、北京师范大学的作者等）的探索。也有一些关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轨经验的研究（陆南泉、许新、张仁德、刘文革等）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曾经或正在为推进我国经济转轨做出重要贡献。

研究我国的转轨实践，或者研究外国的转轨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将两者对照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就有可能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并有新的发现。近几年，国内外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文献也不能说很少，然而，多半集中于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方式的比较与争论。在这一讨论中，多数学者根据制度变迁的实际步骤和进程，认定中国是渐进转轨的典型，俄罗斯是激进转轨的典型，并且从实际的经济效果得出结论：前者优于后者。罗兰应用理论模型分

析谨慎地指出,“在总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渐进主义策略可能是一种好方法;相反的,“在不确定性纯粹是个别的和特异的”情况下,“大爆炸方式总是优于渐进主义”。^① 实际转轨的进程表明,不确定性不可能是个别的,因此,理论分析与依据实际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致的。萨克斯等人所推行的“大爆炸”转轨或“休克疗法”,依据的是医治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在实践中碰壁后,许多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强烈呼吁“超越华盛顿共识”。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渐进式转轨的成功,在世界上赢得赞誉,并且形成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识”。

然而,激进与渐进之争并未到此结束。萨克斯等人争辩说:“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1997)。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中国根本没有进行宪政转轨,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实现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还同步进行了宪政转轨。转轨的经济绩效要看长期,不能只看短期。现在得出渐进优于激进的结论为时尚早。^② 如果说学者们尚无定论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当政者出于政治目的却当机立断对此做出结论,尽管中国已经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至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却并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在2002年9月表示,不准备改变其于1998年给予中国的“过渡型经济国家”地位之政策;相反,尽管俄罗斯截止到2002年9月仍未加入WTO,但是美国和欧盟却在2002年6月初分别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③。近来,有的中国学者也指出:“从总体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后转型期’,即

① [比]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② [美] 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布什致电普京 美国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新华网2002年6月7日;《俄罗斯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环球时报》,2002年6月7日。

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如果按照一些学者对于‘转型’的定义，‘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这一说法，俄罗斯已经在立法程序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即‘宪政制度的转变’。在国际社会，俄罗斯已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①

这样，由激进与渐进之争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即转轨进程的根本标志到底是什么？怎样判断不同转轨国家在转轨进程中的位置、转轨的程度和水平？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转轨经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如果说在以往研究中，这个问题还没有显得那么重要和迫切，那么，现在就不同了，它已经提到日程，已经不能回避，特别是在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已经成为这一研究中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才能把握经济转轨的共同趋势，明确不同国家的差异和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别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懂得，应当向别人学什么，不应当学什么，以及怎样去学习，以便迅速推进我国经济转轨进程，实现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为了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需要探讨一系列有关转轨的基本概念和标准。这对于把握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科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经济转轨的概念

1989年，原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纷纷瓦解，并且先后宣布，放弃计划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于是，开始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实践。但是，认识、路径、政策各不相同。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跟踪而后又从理论上研究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和形态，并且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经济学”或

^① 田春生：《论普京治理经济的理念与俄罗斯经济发展》，载于《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6期。

“转轨经济学” (transition economics)。

“转轨”这个词是个外来语，它来自英文中的 transition，其原意为过渡、转变、变迁。为了研究的需要，这个词后来在我国，有人译为“转轨”，如“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被译为“中东欧转轨经济”^①；也有人译为“转型”，如比利时热若尔·罗兰的名著“Transition and Economics”被译为《转型与经济学》。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意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

俄罗斯学者大都使用这样的俄文词“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过渡时期）或“Перех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过渡经济）来研究转轨经济。这符合俄罗斯人研究制度转变的传统，在列宁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文献和论述。例如布兹加林和拉达耶夫就把俄罗斯 20 世纪的过渡经济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过渡时期；二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②

转轨是一种改革，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改革，不能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调整等同于经济转轨。改革有两种类型：（1）原有体制总体框架不变，只作局部改革，例如，原有的计划体制不变，只在原有体制基础上做些改良或修补；或者原有的市场体制不变，只是加强一些政府干预或更加自由化等等；（2）通过改革使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例如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显然，只有第二种类型的改革，即发生体制性根本转变的改革才能称得上经济转轨或转型。

国内许多研究者往往把转轨与改革视为相同概念。如张军在

① 见《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4 年第 1 期，第 11、144 页。

② 见布兹加林、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期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 页。

1997 年将 Transitional economics 译为“过渡经济学”，并且指出“过渡经济学”也称“转型经济学”或“改革经济学”。在以后的文献中，他进一步指出：“在现有的文献中，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过渡、转型、转轨、经济改革、市场化等等，基本上指同一个含义”（1998）。周业安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也指出：“改革从内涵上基本等价于市场化、体制转轨或过渡，因此，本文常混用这些术语”（2000）。如上所述，转轨与改革有共性，在其共性的基础上进行某些研究，两个概念混用并无大碍。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选择而必须严格区分两个概念时仍然将其混用就会酿成大错了。一是从空间上说，转轨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不能包括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或瑞典及其他欧洲国家；二是从时间上说，转轨是指计划经济国家向着一个明确目标，即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如俄罗斯早在 1965 年的苏联时期就已经实行大规模经济改革了，但那时的改革只是为了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不能归于“转轨”范畴。苏联 1991 年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1991 年解体，俄罗斯于同年独立。因此，俄罗斯的真正转轨只是从 1991 年才开始起步的，从改革到转轨，前后相差 1/4 世纪。有人担心严格区分“转轨”与“改革”会背离人们的习惯，不便于交流与研究。实际上，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许多混乱，如将中俄经济转轨与日本体制调整和亚洲“四小龙”市场化改革相提并论等，都与上述两个概念的混淆相联系。从国际上看，“Transitional economics”概念的出现，也是针对 1989 年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后整个计划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背景而言的。因此，按照国际的习惯，转轨一词的内涵应当是很清晰的。

国内外许多学者力图扩展“转轨”这一概念的内涵。他们将转轨等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从而将其应用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分析，即凡是由前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变迁都叫做“经济转轨”。

有些学者主张将“转轨”这一概念扩展至发展中国家，提出转轨经济研究中的“二元转型”假设。认为转型不仅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包括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诚然，对“转轨”概念的这一界定，便于将原计划经济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连成一体进行研究，也有一定的依据，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尽管如此，“二元转型”假设仍然值得商榷。因为“转轨”这一概念不仅取决于目标，也受制度转变起点的制约。两者的起点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的起点都归结为相同的自然经济。一般发展中国家是直接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而转轨国家从自然经济走出来，中间还经过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然后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有的转轨国家（如前苏联和捷克）甚至经过的曲折更多，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所以，不论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曲折有多少，转轨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前的起始点，不是一般自然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严格来说是计划经济的末端）。它们起点的不同，还不仅表现在体制转换的时间和背景的差异上，重要的是作为起点的体制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起始体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转轨国家的起始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正因为这一区别，转轨国家往往面临产权根本改革的首要任务。再者，如果把转轨的起点规定为一般的自然经济，那就不仅会把转轨国家扩展至所有发展中国家，还会导致扩展至所有发达国家，因为最初发达国家也是以自然经济为起点走向市场经济的。因此，一旦放松转轨起点的界定，就会将所有以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都囊括在“转轨”概念之中，其时间跨度从14、15世纪直至今今天还在持续，绵延600多年。显然，这就把转轨经济的现实研究变成了制度变迁史的研究。

国外也有的学者将这一概念扩展至一般的制度调整过程，如青木昌彦以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调整为例，把转型看做是“曾经运转良好的旧制度已经变得过时，并根据新状况做出调整”，

认为这是“制度转型的另一视角”。但是，他这里所谓“转型”，使用的英文词是“Transform”，而不是“Transition”。^①看来，他这里所说的日本体制的“Transform”，还不是我们所说的“转轨”或“转型”，相当于上述的“改革”。

还有人将转轨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延伸，即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均称为“经济转型”国家。^②今日之转轨与那时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进行的“再市场化”虽有共性，但一个重大区别是那些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只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备战和战争时期）实行“统制经济”，而且历史短暂。它们的“统制经济”与其说是体制不如说是一种政策，不可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相提并论。

总之，经济转轨是一个特有概念，它专指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某些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概念的界定关系到转轨经济的研究对象，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将会在经济转轨研究特别是经济转轨比较研究中，引起极大混乱。

二、经济转轨的性质

经济转轨究竟转到哪里去，这一点决定着转轨的性质。关于经济转轨目标的设定，在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 目标是现代市场经济，这是国内外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在罗兰的书中关于转型目标是这样定位的，即“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转型”^③。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政府领导人都持这

① 见〔日〕青木昌彦：《制度转型中的日本经济》，2003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

② 见陈舜：《经济转型与制度选择》，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 页。

样的观点；

2. 目标是“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观点以科尔奈为代表。他指出：“实实在在的历史变化过程证明了那些人所预言的——将发生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尽管各国的过渡并不是同样的快，并且在相当多的国家内存在着停滞和反复，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转轨的方向是朝着一个资本主义制度。”^①

3. 目标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有一些俄罗斯学者持这种看法。布兹加林和拉达耶夫认为，俄罗斯过渡经济目标的选择应当在方法论上突破过去的传统，即突破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两难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不被绝大多数居民所接受，“资本主义选择”也是如此。至于市场经济，“是俄罗斯过渡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目的本身”。根据俄罗斯的国情和经济理论的新进展，俄罗斯战略前景趋势应当是“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所谓后工业化时代，是“不同的文明相互接近、相互融合、逐步形成统一的、整体的世界文明的时代”。^② 俄罗斯《经济理论》的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然市场在所有文明中都可以发生（的确，它的作用是不同的），那么，目前过渡时期的实质就不能归结为向市场的过渡（不能由市场过渡到市场），而要归结为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关于目前俄罗斯向市场过渡的论断，可以表明如下一点：我们处于粗俗的旧框框、刻板公式的束缚之中，按照这些刻板公式，社会主义（俄罗斯建立过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在其中）是同市场不协调的，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两极，等等。”并且进一步指出：“如果把过渡时期理解为一个驱除过去文明和产生新文明的危机阶段，那么，根据列宁格勒经济学家 В. И. 库兹明和 А. В. 日尔蒙斯基的计算，它

① [匈] 亚诺什·科尔奈：《制度范式》，载于吴敬链主编：《比较》（1），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

② 见 [俄] 布兹加林、拉达耶夫：《俄罗斯过渡期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6页。